

抗日时期的柳州图书文具业

盛德萱

一

抗日战争开始时期，柳州的书店和文具店寥寥无几，开设在庆云路（现中山中路）较大的几间书店：其中有福记书局、兴盛书局、强华书局、元益商店、利群商店、生盛昌印务书局等六家，经营的图书文具大部分是由梧州四大书店（上海商务印书馆梧州分馆、上海中华书局梧州分局、上海世界书局梧州分局、梧州文渊书局）购进，以中学教科书为主，其次多是教学参考书和各类古典文学、小说等等，有几家还兼营部分文具纸张。

当广州、武汉相继沦陷，国民党党政机关军事院校及沦陷区大批学校、工商企业、金融机构纷纷内迁，大批难民撤退来广西、云贵一带。那时四战区长官部也设在柳州，加上由广州、上海、武汉撤退的文化界、文艺界、教育界、名作家、出版社、报社、大书店大部分也撤退到桂林，其中由梧州最先迁来柳州的还有梧州中华书局、商务印书馆、乐群书店、莫林记报局；同时，由广州迁来的还有开明书店、生活书店、新亚书店、北新书店、新生书店、上海图书杂志公司，还有由武汉、长沙、桂林迁来的有国新书局、荣

记书店、强记书店、群众书店、青年书店等。这些新迁来书店大都集中开设在庆云路（中山中路）、东大路（现中山东路）、培新路（现立新路），由于外地大量书店迁来柳州，而使本地原来几家书店也逐渐转营文具纸张文化用品。

当时迁来柳州这些书店经营范围方面也各有侧重。如商务、中华两家经营的图书都是发行本版的教科书、各种社会科学、科技、文学、文艺、中外名著、百科全书、万有文库；四库全书、四部备要、历代经典著作；以及辞源、辞海、辞典等各种工具书。

从上述两家出版的图书目录来看、所刊印发行的图书各有数千种之多、都行销全国各地及海外香港、新加坡、南洋一带。

从全国来讲，还有一家较大的书店，这就是上海世界书局，它曾于一九二六年在梧州设立分局。在抗战前，由于它在几家大书局激烈竞争中失败，以致梧州紧张时结束没有疏散就来柳。

那时外地疏散来柳的书店以开明书店、生活书店、上海杂志社出版经营进步书刊为主。新亚书店、北新书店经营有各类教学挂图和学生读物。国华书局经营文艺、文学及学生课外读物及各种参考书。国新书局、荣记书局、强记书局、强华书局经营各种古今小说、通书（历本）等。至一九三八年，各地疏散来柳的书店和文具店又有不少变化：原来经营图书的几家书店，由于外地大批书店疏散来柳，致使一些图书生意逐渐衰退。如：福记书局、兴盛书局、生盛昌书局、元益商店、利群商店等五家改营文具生意。至一九四〇年开

明书店并到桂林、新亚书店也迁并到贵阳。

原新亚书店经理王吉人（江苏丹阳人）与光明书店周润波在培新路开设国风书店，当时上海几大书局出版教科书已在抗战后方贵阳重庆印行，由七联（商务、中华、世界、开明、大东、正中等六家与贵阳文通书局联合）出版，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审订注册的统一教科书，版权所有不准翻印。但国风书店经理王吉人与第四战区长官部印刷厂互相勾结大量翻印，后被七联发觉向法院起诉，但久久不予处理。于一九四四年桂林上海印书馆经理钱辅卿来柳州，为了国风书店翻印其出版的两本书（学生模范作文、学生模范日记）。这两本书原由梧州乐群书店在广西打开销路、为各县小学采用作学生辅助课本，销量很大，几家大书局也对国风书店这种行为深恶痛绝。钱辅卿来柳后即聘请张兆元律师，代向法院起诉，但终因无法进长官部印刷厂查明事实，钱经理只得每天守在浮桥码头，有一天从河南长官部江边码头运出一船书至浮桥码头起岸，被钱及法警当场查出被翻版的教科书及模范作文日记等书，后来法院将国风书店查封。那时正值日寇逼近广西，柳州紧急疏散，国风书店已将大部分图书疏散到贵州独山。经理王吉人携家眷逃到都匀，后来独山大火，这大批图书被焚，王吉人也在都匀病逝，这样，一场官商勾结的讼案便不了了之。

二

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四年柳州的书店和文具店由原来的六、七家发展到五十多家，于一九三七年成立了图书文具业公会，选任（生盛昌经理）黄琳为理事长，当时会务主要

是摊派捐税、收缴商会会费等，会员无任何权利享受。在抗战初期由于外地疏散来柳的图书文具较多、市场供应未见紧张，但到一九三八年以后，图书要靠桂林和重庆来货，大部分书刊杂志是用土纸印刷的、文具教育用品除部分在内地能生产外，大部分要由沦陷区上海、广州进货。那时最缺的文具有办公用品、学校和学生教学用品、科学仪器等，如复写纸、誊写腊纸、印刷油墨，价格猛涨，因此有同业不怕道途艰险由玉林步行至湛江（原有公路被破坏）乘海轮经香港转至上海采购运回，往返需一两个月，运什费用几乎是货价的一倍。至一九四〇年上海有很多文具厂商内迁，对柳州文化用品供应有所缓和。但每逢学校开学，学生用品：三角板、元规量度器、计算尺、作业本及教学用品、科学仪器、数理化教学工具等等，供不应求，价格飞涨。福记书局不失时机在北门湾塘路菜园地盖起简易房屋，购制木铁结构划线机，以手工操作，生产各学生作业本、练习本、软皮抄本、日记本、批发给同业销售。三达文具社在北大路租得住房，生产墨汁、油墨、浆糊等。但是有很多文化教育用品在内地尚无法生产，要靠上海厂商大批经香港湛江玉林运来柳州，再由柳州运销给省内桂林南宁梧州等地。还有很多文具商在柳州设立临时批发机构，引来贵阳、昆明、重庆等后方中大城市经营文具的商贩。这些商贩大部分是经营文具的内行人，很多是上海鼎丰文化教育用品社、科学仪器馆、广州实学通艺馆等大公司的职员，在公司裁员的情况下离职改做行商（当时叫游击生意）。很多人发了财，同时也缓和了抗战时期后方文化教育用品供不应求的局面。但好景不常，到一九四四年八、九

月间，日军侵入广西，柳江商会通知各商店紧急疏散。

当时人心惶惶，国民党县府专员公署、四战区长官部等机关，到处封车封船，首先疏散官兵眷属、各车站码头一片混乱。图书文具业的店铺，疏散较早的是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两家，他们库存图书数量多、大部分由水运向融县三江一带疏散、还有几家老店刘福记、祝兴盛、生盛昌在柳州经营时间较长，对柳州附近各县乡镇的人交往甚密，有些还有亲戚关系，他们都向柳城、凤山、大埔、柳江穿山三都、象县中平、罗秀等地疏散，而抗战初期由广州、上海、梧州及武汉长沙先后迁来柳州的图书、文具店，都由湘桂铁路和公路的沿线向贵州的独山、都匀、贵阳、方面疏散。还有几间书店到贵阳后继续向昆明重庆疏散。回忆当年柳州疏散时的一段情景，真是惨不忍睹。记得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几的一天，火车站内、外，挤满了难民，大部分是由湘桂路沿线撤退下来的。有军队、公教人员、有老百姓。再加上柳州疏散出去人和行李物资，都堆卧在月台和露天，估计也有两三万人，很多火车的车皮车厢排列在铁轨上。车皮和车厢上都用粉笔写了“长官部封用”、“铁路员工家属封疏散车”等等。很多人在月台内外睡卧数天，一见有车开动，争先爬车，扶老携幼。有些爬上车，又被赶下车，哭喊喧闹秩序大乱。有些难民爬上车厢顶蓬，更有些难民用木棍门板绳索绑在车底，一家老小爬进里边睡卧。有几次夜晚敌机空袭。飞机场投下许多照明弹和炸弹，一时人群乱跑，火车底下挤满人。等天亮后，很多难民的行李物资被偷，车站军警也无法维持，一片混乱，真是风声鹤唳一闻火车开动，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我

抗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柳州钟表业

许待安

（一）柳州市钟表行业发展变化的情况

1937年抗日战争以前，在柳州市（过去称为柳江县）没有完整的一家专业性的钟表店，只有在培新路有一家均和百货店（现在饮食公司办公大楼），兼营钟表摆卖手表、挂表不多，只在柜台行列里摆一角。另外在驾鹤东路有一家叫天大的修理钟表店（现在大桥左边食品公司驾鹤门市部），它是一家修理钟表和单车，兼卖一点旧钟表，老板是邓荣芳，一家人有的修钟表，有的修单车，也不是专业性的。

抗日战争以后，我父许有恒与友人合伙在上海租用亨达利钟表店招牌，来广西梧州经营钟表眼镜店，合伙资金共二万多元，上海股东占大股（占总资金约五分之四），当时组织的形式是经理周伦镛、副理许有恒、协理周庆棠，帐房（会计）由上海股东派下来。店内经营权经理是名誉上的，实际是由许有恒全权负责，协理周庆棠协助经理管理好企业，责任是对上海股东负责。

（紧接上页）家老小四口有幸碰见了在铁路工作的同乡，帮我们挤上了铁路员工家属疏散车逃出柳州。以上记述是凭个人回忆，遗漏和不准确的地方在所难免，请了解情况的同志予以指正和补充。（市民建、工商联供稿）